家在旅途中:

辛西亞•角畑的小說《浮世》中之家、旅行與 (不)流動

鄧秋 蓉*

要 摘

本文閱讀辛西亞·角畑(Cynthia Kadohata)之作品《浮世》(The Floating World),旨 在探討小說中所呈現的家、旅行與工作之主題與意象,並指出這三個主題其中所牽涉(不) 流動的議題。出版於 1989 年,本篇小說篇幅不長,描述一個日裔家庭三代的生活,在五 ○、六○年代,隨著工作轉換而在美國西岸不斷旅行、搬遷至阿肯色州的過程,以此方 式再現第二、三代日裔美國人之生活情境與困境。本文將探究兩方面的議題:(一)小 說《浮世》呈現的家有何特殊性。不同於一般想像,小說裡的家並非穩定、扎根於一處 的居所,甚至可以說是一種流動的家;(二)小說呈現的旅行與工作之關聯,兩者皆具 有流動意涵——前者是地域性的流動,而後者則是社會階級的流動。然而,小說中的旅 行與工作往往也意味著無法流動,與家的不穩定性有著一定的關聯。換言之,藉由分析 小說中的家、旅行與工作等主題與意象,本文希冀凸顯隱藏在文本底層的另一根本議題, 即二十世紀中期、二次大戰後日裔美國人所面臨(不)流動的問題。

關鍵詞:《浮世》、家、旅行、工作、流動

2018年10月5日收到稿件/2019年5月17日接受刊登 《英美文學評論》34(2019): 1-24 | ©中華民國英美文學學會

DOI: 10.6711/REAL.201906 (34).0001

鄧秋蓉,現為淡江大學英文學系副教授,研究領域包括美國文學與族裔文學。感謝匿名審查人 對於本文提出之寶貴意見與修改建議。本文初稿發表於第 25 屆英美文學學術研討會,同時本 文也是科技部計畫部分研究成果(MOST 106-2410-H-032-016-)。

Home on the Road:

Home, Travel and (Im)mobility in Cynthia

Kadohata's The Floating World

Chiou-Rung DENG§

ABSTRACT

This paper seeks to focus on the issues of home, travel, and travail, all of which involve the idea of (im)mobility in the Japanese American novel, Cynthia Kadohata's *The Floating World*, published in 1989. Depicting the dilemma faced by the second and third generations of Japanese Americans in the wake of World War II, *The Floating World* represents a Japanese American family, traveling along the west coast of the U.S. and moving their home to Arkansas, as the father changes or searches for jobs in the 1950s and 1960s. The paper is divided into two parts; in the first part, "homes" are imagined in a different way than the traditional conception of home as a stable, rooted site of dwelling where identity is formed and the sense of belonging is nurtured. Indeed, in *The Floating World*, homes are mobile. In the second part, the ideas of travel and travail are intertwined with each other. The former involves geographical, territorial mobility while the latter leads to social mobility. Nevertheless, both are implicated in the economy of immobility and related to the instability of home in the novel. By analyzing the ideas and images of home, travel and travail, this paper intends to foreground the underlying issue, the problem of (im)mobility, confronted by Japanese Americans in postwar America in the mid-twentieth century.

Keywords: The Floating World, home, travel, travail, mobility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nglish, Tamkang University.

all the

日裔美籍女作家辛西亞·角畑(Cynthia Kadohata)撰寫的半自傳小說《浮世》(The Floating World), 出版於 1989 年。其篇幅不長,描述一個日裔家庭三代的生活,在 五〇、六〇年代,隨著工作轉換而在美國西岸不斷旅行、搬遷至阿肯色州的過程, 呈現出日本移民者及第二、三代日裔美國人的家及生活情境與困境。家的樣貌與旅 行的經驗是角畑的小說經常關注的焦點(Lee "Interview" 166)。小說由主角奧莉薇 (Olivia)第一人稱的敘事觀點,以其青少年時期至高中畢業後打工、等待申請大學之 經歷為主軸,敘述這期間不斷移動的家庭生活、個人感情、工作等事件,同時回溯 家族過往移居美國的歷史。大致而言,小說環繞於三個主題:家、旅行、工作;甚 至小說敘事一再凸顯三個主題與(不)流動性之密切關聯。因此本文將探究兩方面 的議題:(一)小說《浮世》呈現的家有何特殊性。不同於一般想像,小說裡的家並 非穩定、扎根於一處的居所,甚至可以說是一種流動的家;(二)小說呈現的旅行與 工作之關聯,兩者皆具有流動意涵——前者是地域性的流動而後者則是社會階級的 流動;然而,小說中的旅行與工作往往也意味著無法流動,與家的不穩定性並非毫 無關聯。藉由分析小說《浮世》如何呈現流動的家、旅行與工作的主題,本文處理 隱藏在敘事底層之流動與無法流動的議題,探究日裔美國人在二次大戰之後五〇、 六〇年代的生命樣態,以及面臨無法流動的困境。

「家」一直是小說中重要的主題。以離散研究而言,學者布菈(Avtar Brah)直言:「離散的概念之中,家是重要的次文本」(180)。「家」是身分認同、歸屬感形成的重要場域,當離散主體從原本的「家」之所在處遷移至他方,無論為了什麼理由而離開家鄉,從失去家到建立新的家,從離散的旅程到安頓下來、扎根,家始終是心

¹ 進一步說明布菈對於家的看法。布菈認為檢視離散的家,必須認識到家做為「根源」,其意義已經歷轉變,「根源」非永恆不變,而所謂「固定的根源」(fixed origins)必須打上問號,不能以本質化的方式思考,必須放入其形成的歷史脈絡之中(192); 更重要的是,布菈提出,離散者對家的渴望(a homing desire)不能等同於渴望某個「家鄉」(desire for a homeland)(180),不該解釋為渴望回到「根源」之地(193)。

之所繫。同樣地,探討亞美文學作品,²葛莉思(Helena Grice)也認為對於經歷離鄉背井的作家而言,家在亞美作家的創作中占據重要的位置,承載主體的歸屬感與根源 (200)。

然而另一方面,亦有學者指出對於亞美族裔而言,「家園」(homestead)的主題並不切中其生命經驗。黃秀玲(Sau-ling Cynthia Wong)認為亞美文學作品中,建立家園的文本不符合多數經驗,移動不一定以安頓於一個地方作為結局(123),呼應學者史都(Janis Stout)的看法——認為美國文學本身就是「移動的文學」("a literature of movement, of motion") (qtd. in Wong, 118)。黃秀玲進一步討論亞美文學作品中移動、流動與相關議題如失所,才是符合亞美族群的生命經驗。例如加州在 1910 年代通過立法禁止移民者購買土地,³倘若土地擁有權意味著在固定一處建立家園,那麼此禁令讓建立家園困難重重,流動反而成為一種被迫的必要性(Wong 123);然而,亞裔族群的流動卻也遭遇多重限制。⁴例如研究流動概念的歷史,學者科瑞斯威爾(Tim Cresswell)進一步檢視 1882 年的美國《排華法案》,指出其中流動政治(the politics of mobility)與差異政治(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兩者纏繞一起。具體而言,以種族差異為基礎,該法案將華人移民的流動性與一般(白人)美國公民的流動性做區隔,認為前者具有威脅性、容易造成犯罪,而將後者視為正常的流動性,具有普及性及抽象性(177-78);換言之,雖然流動或移動作為不同族裔移民的根本意涵,但移民的流動意涵往往因移民者的族群、階級、職業等差異,而有所不同,甚至受到限制。

² 在此釐清作品分類問題。小說《浮世》歸屬於亞裔美國文學作品,尤其作者角畑出生於美國,大致而言屬於日裔第三代,也就是三世。她父母同樣出生於美國,而祖母來自日本,外祖母則出生於美國(Lee "Interview" 166)。換言之,小說作者並非初來乍到的移民者,而是日裔美國人。而離散一詞的嚴格定義,則指稱移民第一代從家鄉遷移至他國(通常為西方已開發國家);本文並列離散論述與亞美文學討論家的意涵,主要在於小說《浮世》雖然屬於亞美文學,但小說也部分回溯第一代移民(即敘事者的外祖母)的離散經驗;而無論對於第一代移民的離散者或後代的亞裔美國人,家都具有重要意義。關於亞美文學與離散文學之交集與分別,可參考 Shirley Geok-Lin Lim, "Immigration and Diaspora," *An Interethnic Companion to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關於離散的定義可參考 Robert Cohen, *Global Diasporas*。

³ 該項立法原本針對來自日本從事農業的移民,之後涵蓋所有亞裔移民者(Wong 123)。

⁴ 黄秀玲便指出對於十九世紀投入在西部鐵路建設的華裔移民者,所謂流動成了最大諷刺,因這群 移工無法使用促成流動的交通建設,多數人最終被迫落腳、受困於中國城(125)。

若進一步檢視流動(mobility)此概念的歷史演變,不難理解何以流動既是必要卻 也受到壓抑、限制。在不同時代、不同社會脈絡,流動的意涵逐漸從負面轉變為正 面,乃至於正反意義兼具。歐洲封建社會中,流動意味著沒有一個固定的、根源的 所在,因此往往與社會性或地理性的邊緣地帶聯想在一起。例如中世紀猶太人之流 動,一方面出自於猶太人沒有屬於自己的地方,促使其從事商業或進入新興城市裡, 然而對於那些與土地密不可分的社會階層(包括地主或依賴土地而生活的農民)而 言,流動的猶太人變成了可疑人物(Cresswell 11-12)。在此脈絡下,流動可能威脅原 本穩定的社會秩序。等到進入十六世紀歐洲商貿與城市興起,流動才逐漸成為常態。 的確在近兩百年西方現代化歷程中,流動是構成現代生活的主要要件,一方面科技 進展讓人、物的流動與資訊的流通更加快速(15),流動顯然是進步的特徵;但另一方 面,流動也成為焦慮之來源,因其意味著沒有任何東西是固定恆常不變,而萬物永 遠在「變動中」("on the move")(17);換言之,流動既是一種進步,卻也具有威脅而 產生焦慮,因此在全球化的年代裡,人、物、資訊的流動不曾停止,卻同時受到監 控、審查,以揭止其帶來的威脅。觀察當代歐美社會,對於進行移動、流動的難民 或移民,採取諸多防備,甚至防堵難民與移民跨越邊界;或者進入邊界之後,往往 限制這群流動難民、移民的生活範圍與工作機會,可見流動無可避免,也伴隨壓抑 流動的措施。

確實,流動的同時,也可能無法流動。在討論「移動政治學」(a politics of movement)時,巴巴(Homi Bhabha)直指其中「無法移動」(the impossibility of movement)的情況。例如難民與流放者起初是移動與旅行之一環,一旦到達一處之後,為了存活,必須固定於某種意象/形象,形同無法移動。5巴巴的觀點凸顯移動經濟學之中的弔詭,若以亞裔美國人的生命經驗來看,即使亞裔族群往往被視為「模範族群」(model minority),此一形象意味著為了得到美國社會的認可,甚至達成社會流動的目標,亞裔族群必須符合模範的標準,才能生存,也因此框限於某些刻板印象,事實上形成一種無法移動。

從上述幾位學者針對家與流動的討論出發,本文檢視小說《浮世》如何呈現原

⁵ 巴巴提出的「無法移動」主要是為了回應人類學家克里佛德〈旅行的文化〉—文,詳見 James Clifford, *Routes: Travel and Transl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頁 42。

本作為「根源」的家之意象,並進一步分析放置在旅行與「路途」等意象之中,家 傳遞出何種意涵。6同時,《浮世》中另一主題聚焦於工作,揭露日裔美國人工作中 之流動與無法流動的生命經驗。以下本文第一部分討論家與(不)流動之間的矛盾 並存;小說中,「家」與「旅行」的意象交錯並交疊,一如第一人稱敘事者描述其居 家狀態,直言「我們在浮世裡旅行」(Kadohata 2)。小說前半部的情節以全家旅行為 架構,呈現家始終在路途中,處於流動、移動之中;相反地,在小說中,固定於一 處的「家」多半顯得孤立、落寞,令人想逃脫而非鳳到滿足。於是,小說人物踏上 不同的路途,而非回到一個固定的地方。第二部分討論旅行與工作之交集,兩者之 間具有相同字根,同時兩者皆隱含流動與無法流動之間的辨證。一般而言為了工作 而旅行至他方,表面看似具有移動性,然而事實上移動源自於缺少社會流動性。以 小說《浮世》描述的工作與旅行為例,二十世紀中葉日裔族群少數的工作機會包括 雛雞性別辨識的工作(chicken sexers)與季節性的農場臨時工人,前者必須擠在狹窄的 空間,身體無法自由活動,後者迫使日裔族群旅行、移動,兩者皆凸顯其社會性的 「不流動」; ⁷或以巴巴的詞來說,呈現出「無法移動」的狀態。事實上,就某個程 度而言,工作的不流動造成家的不穩定狀態。最後,本文閱讀奧莉薇的「公路敘事」, 進一步延伸探究小說中出現的「公路」意象。而在小說結尾,奧莉薇為了完成親生 父親的工作踏上旅途,更可以從「根/路徑」的交集來解讀奧莉薇的尋根之旅,並 非回到根源之處,而是再次上路。

^{6 「}根源」與「路途」呼應吉洛伊(Paul Gilroy)所提出「根/路徑」(roots/routes)之概念,以這兩個英文同音字及其相反的意涵來討論美國非裔族群的文化認同。吉洛伊認為一般討論多半強調「根」(roots)或「扎根」(rootedness)之意象,但文化認同也可以是一種「移動的過程」(a process of movement)(19),因此更適合用英文同音字「路徑」(routes)來思考。

⁷ 儘管「不流動」並非中文常見的詞彙,本文以此翻譯英文「immobility」,強調流動之相反,刻意以「不流動」凸顯流動可能性之欠缺。特別是表面具有流動性質,實際上卻在階級、工作與族裔的形象等方面形成固著,而將指出相反面的否定詞「不」放在括弧內,本文希望顯示流動與無法流動之弔詭與並存。

壹、流動與不流動的家

小說雖以敘事者的家與家庭為中心,但敘事的背景隱然是無家的狀態;⁸「無家」並非純粹是個人因素,最重要的是,烙印在個人經驗中的歷史痕跡。小說開始,奧莉薇便說明家人時常搬遷,理由有三,一是壞運氣,導致父親工作不順;二是五〇、六〇年代,二次大戰之後十年二十年之間,經歷過大戰期間日裔囚禁(internment)的歷史傷痕之後,日裔的背景還是讓父親不容易找到滿意工作;三是父母感情出狀況,彷彿必須藉由搬遷才能找到出口。乍看之下,奧莉薇指出三個不同的理由,但事實上這些理由隱約環繞著二次大戰期間日裔美國人歷經集中囚禁的遭遇。雖然小說敘事者並未直接點出這段歷史傷痕,但敘事者以青少年的觀點,察覺老一輩(包括其父母)常常激昂地討論「某件發生於過去的事情」,討論他們「失去的一切」,以及某些「地方」(25),⁹小說以隱約、間接的方式,讓敘事者感覺父母與祖父母歷經二

⁸ 幾位學者皆討論《浮世》之中家的主題,如李秀娟指出《浮世》中的家庭結構已非傳統的家庭概 念,在《浮世》中的家,並非穩定的、自我封閉的家庭,小說作者讓日裔美籍家庭進行各種路線 的遷徙,甚至可用「無家」(unhomely)來形容這個日裔美籍家庭,其中隱含此一家庭趨向於外、 異化、陌生化的傾向,因而讓公/私領域相互交雜("Writing Nation" 368)。尼曼(Jopi Nyman)也注 意到,小說中家與流動不斷交錯,在移民者尋找身分認同與歸屬感的過程中,其身分有別於以往 的概念,並非有著固定的起源(198)。另一個討論家的軸線則涉及國/家、公/私領域劃分,如兩 位學者朴由美(You-me Park)與瓦德(Gayle Wald)合著的論文探討少數族裔在美國社會公私領域劃 分中,位居公/私領域的邊界地帶;此界線不僅僅由國家參與刻劃,也同時與階級、性別界線重 疊。該篇論文以《浮世》為例,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日裔美籍的身分是奧莉薇一家人無法成為 美國人的根本原因,更進一步,此非公民身分使其無法擁有自己的私領域——家(609),顯見「家」 此一私領域的形成與國或公領域的介入極為相關。此外,奧莉薇日裔美籍的身分也驅使她必須面 對公私領域之間的協商,一方面奧莉薇的族裔身分比其他美國白人公民更加公共化,另一方面做 為女性,性別讓她必須從屬於家居或私領域,而兩者之間如何協商,成為奧莉薇的生命課題(625、 628)。同樣沿著國/家族的研究軸線,李秀娟則試圖突破「亞裔美國被視為一個國族」(Asian America as one nation)的概念("Writing Nation" 362),提出「亞裔美國人」此族群身分由多數家庭 而形成,其組成的異質性不容忽略,甚至可以將亞裔家庭視為僭越國族、文化界線的空間,成為 性別、世代、跨國協商的所在(366)。綜觀以上學者的討論皆顯示家潛在的變動性與異質性,略為 不同的是,本文將家的變動、不穩定、流動與日裔美國人二次大戰期間遭到囚禁而無法移動的歷 史傷痕做一連結。

⁹ 以下小說引文皆出自此版本:Cynthia Kadohata, The Floating World.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次大戰期間失去家園的傷痛,那是當時十二歲的敘事者無法清楚理解的事,亦是無 法說出、未說出的歷史,而這些不可說的歷史事件形成小說敘事未言明的背景。

二次大戰期間,日本轟炸珍珠港,使得日裔美國人的身分成為可疑的對象,被視為潛在的敵人;而二次大戰之前美國移民政策已經限制日裔人士歸化為美國人,在珍珠港事件之後,日裔族群更是遭到排擠、仇視、報復。甚至美國政府隨即下令將日裔人士拘禁或集中管理、強迫驅離與遷居,許多人被迫放棄擁有的財產與家園(Daniels 199-217)。這段歷史傷痕讓日裔美國人失去家園,成了無處為家的他者,即使在戰爭結束之後,超過三分之二的日裔美國人選擇回到原來的家園,但卻沒有回家的感覺,迎面而來的是帶有敵意的社會氛圍,更遑論有些人的家與土地已無法回復(288)。10無家的狀態仍然如鬼魅般糾纏、揮之不去,如同小說作者角畑提到,這段歷史「彷彿如同鬼魂一般縈繞腦海……,讓我無法擁有百分百的安全感」(Lee "Interview" 180)。同樣地,小說中敘事者的外婆與母親常常透露出安全感的缺乏,外婆見到白人男子接近敘事者,立刻拿起地上的小樹枝,武裝自己(Kadohata 10),敘事者察覺這份武裝出自於害怕。此外,外婆也再三叮嚀敘事者絕不透露自己姓名,絕不讓人知道自己從何而來(19);而敘事者母親對未來總是充滿憂慮,反映著過往歷史造成的心理創傷。

必須一提的是,關於二次大戰期間日裔族群經歷囚禁的歷史與創傷,無論戰爭期間與戰後,個人之間或世代之間存在著不同的態度與面對方式,而幾部作品也將這樣的差異呈現在文學敘事裡。例如加拿大日裔作家小川悅(Joy Kogawa)在小說《歐巴桑》(Obasan)中描繪敘事者的嬸嬸與姨媽不同的面對方式,前者屬於一世(Issei,即從日本移民至美國的第一代,多半非美國公民),經歷囚禁的傷痛之後選擇沉默,對於過往創傷隻字不提;後者屬於二世(Nisei,即美國出生、第二代日裔美國人),主張積極發聲、找回正義、維護日裔美國人的公民權(Yogi 138)。雖然這兩個類型之差異不能概括所有日裔一世與二世之間的世代差異,卻仍說明戰後日裔美國人為了

^{1989,}並以括弧加註頁碼。

¹⁰ 此外,二次大戰結束後,集中營區(relocation centers)仍有三分之一的日裔人士,包括非公民的第一代與忠誠度不明的第二代,遲遲無法離開集中營區。特別因為外面世界的敵意,反而諷刺地讓集中營區成了避風港(Daniels 285),更加凸顯無家可歸的狀態。

融入美國社會,有些人選擇沉默,也有些人主張發聲維護權益。¹¹小說《浮世》中, 作者角畑並未讓敘事者外婆與母親(分別為一世與二世)明白述說二次大戰囚禁的 經驗與記憶,然而,歷史記憶與創傷仍舊隱隱約約潛藏在生活中各個角落。經歷這 番無法移動的囚禁歷史之後,無法移動的噩夢仍糾纏著日裔的一世與二世,儘管屬 於三世的小說敘事者奧莉薇並未直接經歷這段歷史,亦能感受外婆與媽媽對於「家 在何方」、「何處落腳」的焦慮。

將潛藏於敘事之下的歷史背景考慮進來,小說標題《浮世》的確透露出日裔族群的飄盪,反映出一種流動的家。過往歷史讓家無法成為穩定的避風港,在拘禁歷史的糾纏之下,無法移動的恐懼縈繞不去。諷刺的是,敘事者奧莉薇的家彷彿無法停下來定居一處而必須經常移動,常常處於旅行的狀態,在兩地之間過渡(in transit),或是暫居汽車旅館。如同奧莉薇提到,一同旅行的外婆總是略帶自嘲的口吻說道:「我們在浮世裡旅行,這浮世包含加油站、餐館、各種賴以維生的臨時工作,以及田野山區間的汽車旅館;在古代的日本,浮世(ukiyo)指的是紅燈區妓女戶、茶室、澡堂,但也指變化,以及變化所帶來的樂趣與寂寞」(Kadohata 2-3)。在此,奧莉薇的外婆以日本「浮世」的概念,來比喻族裔移民的邊緣性與流動性,相較於家該有的安穩,這樣的比喻更是指向家的變動,或者說家處於變動之中;然而,變動未必全然負面,

¹¹ 進一步閱讀文獻與作品,將發現回應此一事件的不同方式,的確無法以世代做歸納。例如學者大川(Gail Y. Okawa)分析 1942 年在珍珠港轟炸事件之前,已有一群居住於夏威夷的日裔美國人遭到囚禁,這群遭囚禁者多半屬於當地日裔社群一世的領導人物(教會牧師、教師、商務人士),而在囚禁期間,他們不斷撰寫陳情書,訴求對國家的忠誠;雖屬於一世,但他們勇於發聲而非以沉默、消極的方式面對(66)。此外,二世日裔美國人傾向批判囚禁命令(Executive Order 9066)違反憲法保障的公民權,如學者沖廣(Gary Y. Okihiro)回顧囚禁期間二世集結起來並發出宣言,抵抗美國政府的徵兵命令,批判美國政府無法保障日裔美國人的公民自由,卻又徵召日裔美國人加入軍隊(170-72)。另外,也有作品呈現不同的應對,例如二次大戰後 1946 年出版的第一部日裔美國人的作品,由大久保(Mine Okubo)創作的《公民 13360》(Citizen 13360),結合文字與繪畫並敘述自身囚禁的經驗,以較幽默的口吻述說集中營的生活,敘述以離開集中營、前往紐約做為結尾,雖然對於日裔美國人的公民身分提出反思,但避免碰觸較為敏感、激烈的政治話題,而採取一貫樂觀的態度(Sokolowski 82)。另一重要作品則是桑(Monica Sone)的自傳回憶錄《二世女兒》(Nisei Daughter),此作品一方面做為歷史見證,一方面陳述日裔二世融入美國主流社會之努力,以及浮現於兩者之間的衝突與矛盾(Yamamoto 105);兩部作品皆出自二世日裔美國作家,然而其應對態度與方式未必相同。

亦有其樂趣。同時,家與旅行、安穩與變動並非截然二分,奧莉薇自己便認為,「在不穩定的世界裡,他們很穩定地旅行著」(3),意味著在旅行之中處處為家,顯見家 與旅行相互交疊、穩定與變動同時並存。

除了小說標題《浮世》已清楚指出一種流動性,我們更可以檢視小說中奧莉薇一家居住之所在,亦是處於一種流動或旅行狀態。在旅程中,一家人無論是以車為家,或者停留在汽車旅館,或者加油站旁的餐廳用餐,這些暫時停留、居住的所在都顛覆「家」的傳統意涵——固著一處、生根、具有清楚門戶/圍牆/閩(threshold)等。特別是,針對汽車旅館,文化研究學者莫利斯(Meaghan Morris)便認為汽車旅館通常位於公路旁,意味著「移動、速度、永恆的迴旋」(243),換言之,以汽車旅館為家,奧莉薇一家的居家生活便是以移動為主要特徵,不斷地遷徙、進入公路、加速前往下一個休息區、暫時地停靠站,如此不斷循環、迴旋。

家的變動與流動性也清楚地呈現於奧莉薇的家族移民史。經由外婆口述過往經歷,奧莉薇回溯其曾父母移民至美國之時,賴以為生的方式便是經營寄宿家庭(boarding house)。一方面這個寄宿家庭既是移民家庭的家,也是工作所在;另一方面,寄宿家庭接待來自日本到美國打工的旅人,12接待的旅人多半短暫地或非法地居留,且往往身分神秘。如克理弗德指出寄宿家庭的特質,具有「非真實」(inauthenticity)、「放逐」(exile)、「暫時」(transience)、無根(rootlessness)等等意涵(Clifford 18)。也就是說,以家庭為名的寄宿場所,並非生根的場域,寄宿者的真實身分並不是理所當然的透明或容易取得、確認;而最後,外婆一家人放棄經營寄宿家庭的理由則是房子「要垮了,地基搖搖欲墜」(Kadohata 29),一種不穩定的狀態迫使他們再度移動,搬遷至他處。搖搖欲墜的寄宿家庭,具體地呈現移民者的流動感,以及家所在的房子具有潛藏的不穩定性。

¹² 關於日籍移民至美國的歷史,大致說來,1880 年代移民人數開始變得顯著,多半移民至夏威夷與美國西岸,也有不少前往夏威夷的移工在工作契約到期時,轉往美國本土;而在 1907 年美國與日本之間協商同意所謂的《紳士協約》(Gentlemen's Agreement),意圖遏止日益增加的日本人移民。儘管如此,二十世紀初期美國西岸與夏威夷的日裔社群仍呈現成長趨勢,日裔美國人經營的餐廳、寄宿家庭、語言學校等機構也逐漸增加,服務對象主要針對來自日本的勞動者,特別是農業相關工作的勞動者。詳見 Roger Daniels, Asian America: Chinese and Japanese in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1850,第四章。

若以房子來看家的意涵,除了搖搖欲墜的房子,在旅程中,奧莉薇一家人曾經去多觀的「樣品屋」("model homes")(147),其意涵值得探究。旅途中,看到路邊的廣告看板,奧莉薇一家人臨時決定去參觀廣告看板上所宣傳的樣品屋,樣品屋傳遞家的意象,彷彿招喚不斷遷移的這一家人,最後終究以失落收場。當一家人進入屋裡時,仲介為了確定看屋者買得起房子,便以一連串的問題迎接這一家人:「尋找什麼樣的屋子?」「〔職業〕是做什麼的?」「預算多少?」(147-48),每個問題都讓奧莉薇一家人招架不住,因為父母沒有固定職業與收入。事實上,樣品屋內的擺設令人著述、引人渴望卻無法負擔。美麗的房子與窗外的景致讓奧莉薇一家人充滿希望,也因為無力負擔而挫敗加深,甚至日後當奧莉薇翻閱外婆留下的日記,其中寫下當時看屋的經歷,外婆瞧見奧莉薇母親參觀樣品屋時面露悲傷,彷彿這樣品屋提醒她無法企及之想望,無法滿足的空缺。有趣的是,其中一間樣品屋擺設的古董椅子,讓奧莉薇的弟弟脫口而出:「那只是複製品」("copies")(148),而其未說出口的意思是,樣品屋如同擺設的古董複製品,與真實相隔一段距離;進一步延伸而論,對比於奧莉薇一家經歷的飄盪與流動,樣品屋的固定樣貌更顯得虛假,同時也暗示著家之遙遠。

此外,若將樣品屋("model homes")與少數族群的範本 (model minority,或將其詮釋為「模範族群」)聯想一起,樣品與範本(model)都意味著家與少數族群最標準的模樣,是值得學習、仿效、複製的範本,具有稱讚意涵也隱含著規範(Daniels 318),更傳遞出一種刻板形象。「模範族群」一詞出現於六〇年代,最初用以描述日裔美國人在二次大戰之後克服種種障礙,接受良好教育、事業有成、成功地融入美國社會,可作為其他族群之典範,顯見戰後日裔族群一定程度而言改變了一般美國人的印象;13不少日裔美國人努力地展現合作,並以模範自勉。14然而,若只看到「模範族

^{13 「}模範族群」一詞出現於社會學者彼得森(William Petersen)發表於 1966 年的一篇文章(Daniels 317)。丹尼爾斯(Roger Daniels)更進一步指出日裔族群在美國社會優異的表現贏得「模範族群」的稱呼,但也用來指責其他有問題的族群,因而具有規範各個族裔族群的意味(318-21);此外,學者沖廣(Gary Y. Okihiro)也認為模範族群的出現是一種社會建構,有其歷史背景,特別牽涉美國國內各個種族之間的關係,詳見 Margins and Mainstreams: Asians in American History and Culture,第二章。

¹⁴ 歷史學者織田(Meredith Oda)以二次大戰後、冷戰期間的舊金山發展為例,說明日裔美國人在

群」的合作、順從,則忽略日裔社群內部出現要求公民權的「異」見,特別是 1970 年日裔社群全國性的組織——日裔美國公民聯盟(JACL)通過第一份決議內容,要求立法,並且對於二次大戰囚禁的歷史錯誤給予補償,15此舉意味著日裔族群的反抗性,儘管該組織內部與日裔社群也存在保守聲音,而美國社會對於模範族群竟然發出如此「刺耳的要求」感到震驚(333)。此外,「模範族群」的確具有排他性,排除了無法成功融入美國社會的成員,也排除了異質性;針對此一概念,學者駱里山(Lisa Lowe)提出批判,認為模範族群或許嘉惠亞裔族群在白人社會中的印象,但這印象的形成也抹煞了各種身分差異,將差異同質化,反而成為另一種種族歧視,並透露出在白人社會中,對於亞裔族群跨越地理、語言、種族等界線的流動產生焦慮,進而以刻板形象框限、固定亞裔族群(19)。

某一個程度而言,小說《浮世》中「樣品屋」與「模範族群」具有共同特徵:前者光鮮亮眼,雖然引人渴望卻又不真實;而後者的含意表面看來是種嘉許,但卻必須壓抑、除去異質性,才能符合社會期待的模範樣本,因此也意味著限制,未能反映現實中的差異性。若說奧莉薇一家人因不斷移動而無法打造一個如同樣品屋般、理想的家,那麼同樣地,奧莉薇與其家人也抗拒著模範族群的刻板形象。李秀娟(Hsiu-chuan Lee)的研究指出,《浮世》呈現「另類」的日裔美國家庭,而非國族論述一向引以為模範的中產階級家庭。在二次大戰囚禁的歷史創傷之後,日裔美國人的確也試圖以美國中產家庭為範本,努力建立自己的家,企圖更像美國人("Writing Nation" 365-367)。然而,奧莉薇的家並非建立於穩定、傳統的婚姻基礎上,例如奧莉薇的外婆歷經三次婚姻,而奧莉薇的母親則是未婚懷孕有了奧莉薇之後,勉強進入一段沒有感情基礎的婚姻,顯然脫離理想的中產階級家庭範本。不僅家庭結構上不符合模範的標準,在經濟、社會地位方面,奧莉薇的家庭也稱不上模範族群向上流動的成功典範。

五、六〇年代把握機會投入城市建設,形塑模範公民的形象,見 The Gateway to the Pacific: Japanese Americans and the Remaking of San Francisco。

¹⁵ 丹尼爾斯提到,早在六○年代末,舊金山與西雅圖的日裔團體便出現關於補償的討論聲音,由 此可見對於二次大戰的囚禁歷史,此時日裔社群的態度出現轉變,逐漸願意公開討論之前不願 提起的歷史,而其中的原因便是戰後日裔的社會地位提升(330)。

小說顛覆傳統對於家的想像。對比於流動的家,小說也呈現幾個固定於一處的家,然而這些固定的家往往透露出無以為繼的落寞感,而非幸福感或滿足感。例如小說中外婆在旅途中突然過世之後,奧莉薇的母親也突然想起多年不見的繼父,於是決定改變行程,前往拜訪。當一行人來到其住所,繼父的妻子告知繼父已過世之後,讓奧莉薇母親及其同行的家人入內看看,敘事者奧莉薇描述屋內瀰漫一種「薑」與「腐敗」混合的味道,而且這是一個鮮少有人來訪的「家」;儘管屋內以橘色為主要裝飾,意圖為幽暗的家居空間增添光亮,但一股壓迫感油然而生(Kadohata 47)。這個家處於一種孤立狀態,令人感到落寞。離開之時,奧莉薇與母親在屋外,回頭再次凝望這個已經關上門窗、熄燈的屋子,母女詢問彼此究竟看到了什麼,兩人不約而同回答:「什麼也沒有」(49);此處不流動的家失去存在感,顯得茫然。另一個不流動的家則出現在阿肯色州,當奧莉薇一家定居下來,她父親與一群日裔朋友打牌的情境裡,其中一位淺野柯理(Collie Asano)便形容自己的家屋如同一個「幻相」(an illusion)(84),彷彿是一個介於存在與不存在的房子。

儘管不流動的家顯然並不甜蜜,但在漫長的旅程之後,奧莉薇一家終究還是要落腳,結束游牧般的遷徙生活。相對於小說前半段奧莉薇一家人常常旅行、流動,小說後半段則是奧莉薇敘述一家人定居之後的家庭生活樣貌。一旦要建立家園,「家」的邊界成為重要的考量,劃分族群、階級、職業等邊界逐一浮現。明確而言,奧莉薇父母對於在阿肯色州哪一個鎮落腳,存在各種考量與疑慮。首先,考慮在亞絮蘭鎮(Ashland)落腳,但當地沒有任何日裔居民,奧莉薇家人不想成為該鎮第一個日裔家庭,擔心亞絮蘭鎮隱性的族群界線,而界線隱含著排外;接著,鄰近李(Lee)鎮雖有日裔居民,但當地二、三十個日裔家庭多半在養雞繁殖場工作,從事雛雞性別辨識的工作,因此不納入考慮;最後選擇落腳於小鎮吉普森(Gibson),原因是當地所有日裔家庭都以經營小生意為生,敘事者奧莉薇直言:「沒有任何雛雞性別辨識的工作者住在吉普森;也沒有任何經營小生意的日裔居民住在李鎮」(60)。一旦把家建立在固定的位址(fixed address),界線劃分無法避免;很清楚地,族群、職業都成為界線劃分的依據。

更進一步來說,無論考量族群或職業,都牽涉流動的問題。亞絮蘭鎮沒有日裔 居民,意味著在這個鎮上,族裔他者不容易自由移動,若定居於此,奧莉薇一家人

日裔的身分極可能成為醒目的他者。二次大戰期間美國社會對於日裔族群的仇視在大戰之後仍然存在,這令日裔族群恐懼自身成為注目的焦點,進而阻礙日裔族群在公共領域裡移動的自由。一如奧莉薇提到,吉普森鎮絕大多數居民是白人,僅有十四個日裔美國人,「每當家人與親戚在外聚會,總感覺人們瞪著我們看……,因此在公共場所裡,我們都很安靜」(60)。原因不難理解,僅有的少數亞洲臉孔往往引起目光注視,16更不用說過往囚禁歷史造成不安全感的心理因素仍在。此外,奧莉薇家人不希望從事養雞繁殖場的工作,正因為養雞繁殖場的雛雞性別辨識工作與日裔族群緊密相連,不僅加深負面的刻板印象,也讓融入美國社會顯得更加困難。然而,另一方面,職業是社會流動之重要一環,對日裔族群而言,這項工作是少數的選項之一。關於這點,將留待本文下一節進一步闡述。

綜合而言,小說中奧莉薇的家擺盪在流動與不流動之間;即使定居於阿肯色州之後,敘事者奧莉薇進入青春期,一股離家的欲望油然而生,浮現再次踏上旅途的念頭。特別是「家庭」、「父母」所代表的根源,給予敘事者無法流動的焦慮,幾乎是一種「幽閉恐懼」(Park and Wald 627)。奧莉薇提到:有天她一定要甩開父母不知不覺中交給她的事物,尤其是恐懼,包括二次大戰期間父親被捕的恐懼,某天她的弟弟走失的恐懼,擔憂子女未來是否一切安好的恐懼(Kadohata 121-22)。然而離開家庭、父母,隻身踏上旅途,並非意味著家不重要;事實上,奧莉薇不能抹去對於家的渴望,於是當她隻身於洛杉磯租屋,並且在燈具店工作時,奧莉薇購買店裡的燈飾來裝點自己的公寓住所,企圖用一盞燈點亮居住空間,期望增添家的感覺,卻未能達到想要的效果。「家」在敘事者奧莉薇的想像中,既憧憬又虛幻,亦無法具體成形,在在反映文本所提出另一種家的樣貌——不固定、流動、無法成形的家。

¹⁶ 需進一步說明,奧莉薇家人避開沒有日裔美國人居住的小鎮,但不意味他們選擇與日裔群聚而居。一方面小說中描寫的小鎮規模小而未能呈現日裔族群社區集中的情形,另一方面從小說描述可知,奧莉薇父母也傾向不選擇日裔社區而考慮其他因素,如本文討論的職業、工作等因素。丹尼爾斯指出二次大戰之後日裔美國人不如戰前集中於某個地方,以往的日本城已不復存在,而傾向分散、融入美國社會;其中原因包括世代交替,日裔二世、三世成為家庭核心,以及文化與經濟轉變,特別是二次大戰的囚禁造成族裔文化相關機構與特定族裔經濟逐漸瓦解(286)。

貳、旅行與工作

如前文指出,敘事者奧莉薇在小說開始便提到,一家人四處遷徙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父親工作不定,這點出了鑲嵌於文本之中的潛在議題,即旅行與工作的密切關係。以英文字根來看,旅行「travel」與工作「travail」具有某種相關。¹⁷源自於古法文,「travail」意味著勞動、辛苦、辛勞的旅途。¹⁸特別對於早期移民族群,為了工作、謀生而離家,旅行至異國,遷移與工作始終不可分割。除了奧莉薇父親查理歐(Charlie-O)之外,前文提及奧莉薇外婆年輕時經營的寄宿家庭,多半接待短期工作的旅人,也顯現旅行與工作的關聯。

倘若旅行與工作之間存在著字根意義的關聯,但這關聯並非全然意味著為了工作而旅行的日裔族群具有旅行或者流動的自由;也就是說,日裔族群的旅行與工作,即便促成跨地域或社會階層的流動,卻未必出自於自由選擇。再回到小說敘事者奧莉薇的工作經歷,高中之時,奧莉薇曾以打工的方式在養雞繁殖場工作,為小雞接種疫苗;畢業之後甚至成為全職員工,直到離開阿肯色州前往加州洛杉磯。對於養雞繁殖場工作,小說著墨甚多,奧莉薇坦言養雞繁殖場裡,從事辨識小雞性別的人對她來說有種神秘感,他們憑藉直覺判斷小雞的性別,而這份直覺令她著迷。事實上,奧莉薇的敘述隱約指出神秘感源自於外人無法理解此一工作而產生的刻板印象。小說中奧莉薇清楚點出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養雞繁殖場這一領域工作多半由日裔二世所掌控,特別是五〇、六〇年代,全美有五百多人從事小雞性別辨識的工作,

¹⁷ 麥司特森(John Masterson)討論離散小說時,探究旅行與工作之關聯,見 Masterson, "Travel and/as Travail: Diasporic Dislocations in Abdulrazak Gurnah's by the Sea and Kiran Desai's the Inheritance of Loss." Journal of Commonwealth Literature 45.3 (2010): 409-27。其中探討移民經驗中,流動看似正面、值得讚誦的狀態,卻往往忽略對某些階層而言,離散失所帶來苦痛,以小說《繼承失落的人》(The Inheritance of Loss)為例,更清楚看出旅行與工作幾乎是一體兩面。小說主角之一的畢久遠離他鄉去紐約工作,生活相當窘迫,而在鄉親的想像中只有旅行他地的浪漫;但事實上連搭飛機往返美國/第一世界與印度/第三世界的旅行過程,對畢久而言都來帶了許多不浪漫的辛苦。

¹⁸ 維克斯(Daniel Vitkus)研究十六世紀英國戲劇時,便指出早期英文裡兩個字的關聯,「travail」具有三方面的意涵:(一)勞動付出;(二)從一地旅行至另一地所需要的勞動付出;(三)女性生產的痛苦與勞力。其中前兩個意思指向「travail」與「travel」兩字之重疊(229)。

其中多數為日裔族群,是日裔族群得以謀生的少數管道之一,不少人因此致富而能購買車子、房子。當白人記者詢問日裔工作者其中祕訣何在,得到的答案是「憑直覺」(93),白人記者也相信此一說法,因而一股神秘感縈繞著雛雞性別辨識的工作。 19更進一步探究便不難發現此神秘感始終與日裔族群的印象緊緊連結,原因在於現代化的西方國家,包含美國在內,始終都以神秘東方的意象來想像遙遠的日本及其文化(Strauss 582, 585)。雖然奧莉薇隨後推翻有關辨識雛雞性別工作的迷思,但確實反映美國文化對於日裔族群的刻板印象,此一刻板印象認為日裔美國人在文化上普遍繼承日本的國族性格,且具有身體特殊性,尤其適合雛雞性別辨識工作。20

的確,養殖場雛雞性別辨識的工作與族群刻板印象之間存在密切的關聯。如前 文提及,奧莉薇的父母並不認同養雞繁殖場工作,以為從事這樣的工作將使她憤世 嫉俗;然而,未能明白說出口的反對理由其實是養殖場雛雞性別辨識的工作隱含著 低等族群的指涉,尤其是檢查小雞的生殖器帶有低俗下流的意味,而英文的「性別 辨識」一詞(sexers)更會讓人聯想到美國流行電影中所呈現東方人墮落的性與情慾 (Azuma 259)。二次大戰之後,日裔二世陷入兩難,由於此一工作與族裔身分不可切 割,雖可以獲得相當優渥的報酬,但強調族裔身分也意味著美國化之困難;是否要 為了經濟理由,而接受此工作根深蒂固、甚至帶有貶抑的族裔刻板印象,成為一大 難題(259),也是小說中奧莉薇父母不認同的理由。根據歷史學者東一朗(Eiichiro Azuma)的研究,這份工作極度仰賴身體細部動作,甚至,將身體訓練成機器一般, 不斷重複同一細小的動作;而一般業者認為日裔族群特別能夠勝任這項工作,一是 因為該項技術源自於日裔族群的原鄉日本,二是日裔族群的性格善於忍受且極具耐

¹⁹ 根據歷史學家東一朗(Eiichiro Azuma)的研究,神秘感也因為日裔二世壟斷雛雞性別辨識的行業,使得相關的技術往往成為商業機密(258)。

²⁰ 東一朗研究日裔二世發展甚至逐漸壟斷雛雞性別辨識產業之過程,指出三○年代從日本引進最新且最有效的技術。從此,此工作與日裔、日本文化、日本民族性格緊密相連,帶有種族主義的歧視意味;然而,另一方面,日裔二世也利用此一種族連結,掌控雛雞性別辨識產業,即使在二次大戰日裔囚禁期間,美國官方甚至允許雛雞性別辨識工作者離開集中區,前往非限制區域的養殖場工作。而二次大戰後,日裔二世也企圖削減其負面意涵,強調此工作的專業性、技術性與科學,企圖為雛雞性別辨識建立正面形象,但仍難以全面推翻刻板印象(244-45, 252-55, 261-63)。

性,身體易受規訓,可拘束於狹小空間,接受單調的工作(248, 255)。當二次大戰結束之後經歷日裔美國人囚禁的創傷,日裔族群尚未得到普遍的社會認可,在不容易取得工作機會時,這份具有族裔標籤的工作就成了許多日裔族群的唯一機會,凸顯當時日裔族群的社會流動並不容易。工作或許承諾社會流動的可能性,但具有刻板印象的工作也形成了框限日裔族群的標籤,反而造成無法流動。²¹

雛雞性別辨識工作不僅今日裔族群難以進行社會流動,甚至此工作之特性讓族 裔身體難以自由移動,要不就是無法移動,要不就是被迫移動,小說中描繪養雞場 的雛雞性別辨識工作者便是處於「無法移動」與「被迫移動」的矛盾之間。在養雞 場狹小空間裡,重複上百次相同動作的工作內容,有人適應,有人卻瀕臨精神崩潰, 並非所有日裔族群都能承受如此單調的工作、如此壓迫的工作環境。例如奧莉薇在 養雞場認識的日裔男孩——唐(Tan)的父親,由於養雞場往往在醜陋又幽閉的建築物 裡,唐的父親往往得深呼吸一番才能進入養殖場。工作三十年,唐的父親有時在夜 裡清醒,發現自己如同工作機器一般,手正快速又精準地動作,而最後,唐的父親 幾乎精神崩潰,工作之時總是唸唸有詞,因而被泊離職;諷刺的是,精神異常的狀 態反而成為另一種挑脫的出口。雛雞性別辨識的工作空間相當狹小,在其中工作的 人往往無法自由地伸展身體,幾乎完全固定在同一姿勢而不得移動,呼應二次大戰 之後日裔族群的處境,即無法找到其他工作而必須讓身體置於狹小空間中。但是另 一方面,矛盾的是,從事這項工作的日裔族群也常常需要旅行至別處,到別州的養 殖場工作,因此即便工作能夠養家活口,被迫經常旅行而無法在家的狀態卻也讓家 庭難以維持(Azuma 258)。換言之,因工作的緣故,養雞場辨識雛雞性別的工作者(通 常為日裔族群) 夾在無法移動與被迫旅行之間。

此外,除了養雞場辨識雛雞性別的工作,小說一再指向另一個日裔族群僅有的工作選擇,也就是季節性農場移工,在加州各地農場之間旅行留下了痕跡。開車與弟弟、男友安迪(Andy Chin)沿著西岸從加州進入奧勒岡旅行之時,敘事者奧莉薇形

²¹ 朴由美(You-me Park)與瓦德(Gayle Wald)在合寫的論文中指出奧莉薇的工作給予她這樣一位族裔與性別他者界定自我身分的機會,進而能夠取得社會流動、自我隱私(私領域或家)與公共身分(工作)(627);然而另一方面,本文希望探討的是,小說凸顯五、六○年代族裔他者能夠從事的工作選擇相當有限,因此帶有族裔標籤的工作也造成無法流動。

容眼前所見的地景是一片綠意盎然的景色,引起奧莉薇回想曾經在書中讀過貫穿美國的三條河川,分別在西岸、東岸與中西部,但那三條河川非河水流經之處,而是「每年農作季節,遷徙的農民移工在這個國家〔各農場之間〕旅行所形成的河川」(Kadohata 146)。事實上,農民移工因工作而必須不斷移動,往往處於邊緣地帶,而在小說中,透過奧莉薇的旅行,再現季節性移工移動的路徑,讓印刻在土地上的痕跡能夠顯現。的確,農民移工的邊緣性總是令奧莉薇聯想到非人的處境,彷彿是「農場上遷移的動物,處於過渡狀態,從剛剛結束的辛苦生活過渡到未來可能更辛苦的生活」(149)。

小說中凸顯旅行與工作之間的關聯,也同時強調了「公路」的意象。的確,在 小說敘事中,公路成為很重要的背景,無論是奧莉薇一家人的遷徙旅行,或是奧莉 薇敘述這耥與弟弟、男友的開車之旅,都讓讀者不禁聯想到公路敘事(road narratives)。然而,從敘事者奧莉薇——即日裔美國人的角度,小說裡的公路敘事呈 現另一類非美國白人男性為中心的敘事文本。學者普摩(Ronald Primeau)指出公路的 迷人之處在於「冒險、逃避、打破日常」等自由的意象(15);然而,公路敘事多半以 白人男性為主角,美國原住民、非裔美國人與其他少數族裔在北美的遷移歷史,往 往不是追尋或冒險,而是逃難(107)。在小說中,原本應該是促成流動、象徵自由的 公路,應該是城市之間的動脈,但在奧莉薇的敘事中成為歷史標記、族群區分的界 線。例如在加州至奧勒岡之間,開著車行駛在九十九號公路上,奧莉薇回憶起二次 大戰期間日裔居民被迫搬遷,便是以公路為基準;行駛於九十九號公路,奧莉薇提 到「父母的幾個朋友以前住在九十九號公路以東,但二次大戰開始,法律規定日裔 居民必須搬到公路以西,於是大家整頓行囊,搬到公路對面,隔年就被囚禁(Kadohata 140-41)。九十九號公路不只是旅行的路徑,也是區隔合法與不合法的界線,原本應 該是形成流動的公路,在這段父母親不願碰觸、談論的族群歷史中,成了無法流動 的標記。

再者,車子的意涵也有變化。不只是旅行的交通工具,車子也是短暫停留、交會的場域。在小說一剛開始,敘事者就描繪了一家人旅行的汽車;如前所述,汽車成為敘事者一家人在旅途中的家,在車內彼此交談或情緒交會。然而,如同敘事者奧莉薇坦言,在車內並非時時刻刻都和諧融洽,往往高速行進的汽車與車內近乎停

滯、幽閉的氣氛形成強烈對比,甚至有時必須開窗,讓停滯的空氣流通,讓人暫時探頭出去。除此之外還有高中畢業之後,奧莉薇決定隻身前往洛杉磯打工,當時她所搭乘的公車。克里佛德探究「旅行」人類學之時,便指出文化的「時空體」(chronotope)不一定是村落裡的帳棚,22也不必是控制各種變因的實驗室,反而是「旅行中相逢的場所」,如「飯店大廳、城市裡的咖啡館、船與公車」,更清楚呈現旅行的「失所」、「互相干擾」與「互動」等情境(Clifford 25);若以奧莉薇前往洛杉磯時搭乘的公車為例,公車成了奧莉薇與其他旅人相逢的場所。一個男孩號稱養了紅尾蛇,要去好萊塢賣給一位歌手兼演員,一對瑞典夫婦送給奧莉薇一本書,一位前海防隊人員說著阿拉斯加多麼冷又空曠,一位甜美的妓女,以及車上歡愛的男女(Kadohata 123-24),從阿肯色州到洛杉磯,四十個小時的車程,奧莉薇彷彿進行一趟浮世之旅;的確,奧莉薇的描述引出旅行的根本情境,即「失所」與「互動」,在公車上所形成的時空體之中,從何而來並不具備深刻的意涵,僅僅只是一個標示的形容,更重要的是旅人的目光交會,短暫的干擾或相伴。

值得注意的是,小說常常以汽車、公車作為時空體,再次反映出小說場景不再是固定於一處、紮根的居家;而如同前兩段指出,轉移至公路與相關的時空場域包括汽車、公車,²³尤其指向車外空間的迭替、時間的流逝,呈現出流動感。當然汽車與公車並非毫無差別,若以上述汽車與公車做比較,其中人際關係具有差異:與家人旅行的汽車內,關係明確且固定,彼此共同擁有過往回憶、歷史,也對彼此互有要求;然而在公車之內,人際關係相當表面而淺薄,沒有共享的過往,卻有相同、指向未來的目的地。如此的差異也影響著敘事的氛圍,一家人的汽車裡往往氣氛凝重、濃厚,需要開窗透氣,而與陌生人共乘的公車上,無論其他乘客做甚麼,對奧莉薇而言都意味著一種探索與可能性,換言之,踏上前往洛杉磯的旅途,搭上公車,

²² 關於「時空體」(chronotope)一詞,在此補充說明。文學理論家巴赫汀(M. M. Bakhtin)於"Forms of Time and of the Chronotope in the Novel"一文中,以「時空體」一詞指出小說中時間與空間之關係,而不同特徵的時空體界定了不同的文類。人類學家克里佛德則以「時空體」一詞指出旅行中時間與空間交織形成不同的場域。

²³ 小說往往呈現多種時空體,如巴赫汀所言,「各個時空體同時並存,相互交織、取代或對抗」(252)。 關於家與公路形成對比的時空體,亦可見 Julie Hansen, "Space, Time and Plane Travel in Walter Kirn's Novel *Up in the Air.*"。

與來自各方的陌生人短暫交會,彷彿奧莉薇的世界開闊了,時間不再停滯,而是朝向未來前進,一如小說作者在訪談中提到,奧莉薇想要的是「面向未來」(Lee "Interview" 183)。

小說敘事最後結束於一趟重要的旅行/工作,藉此敘事者奧莉薇回顧、整理過往。在最終章,奧莉薇在旅途/工作中與親生父親的鬼魂展開對話,此片段同時環繞在「旅行」與「工作」之間,兩者結合為一。奧莉薇偶然接獲消息,得知久未見面的親生父親傑克(Jack)過世,並接受傑克的妻子請託,代替親生父親完成生前的工作——進行販賣機商品補充與維護,而此一工作的基本要求便是從一地旅行至另一地,呼應小說一再指涉的主題,即為了工作而經歷旅行、踏上旅途。更明確而言,親生父親生前負責一個路線的販賣機,涵蓋加州、亞利桑納州與內華達州,一旦販賣機空了,若未能立刻補滿商品,新的販賣機將進駐並且取而代之;為了不失去這條路線的販賣機經營權,傑克的妻子打電話請求奧莉薇協助,奧莉薇因此踏上這趟工作之旅。

這次旅行/工作也是奧莉薇解開疑惑、密碼的過程。首先,每一個販賣機都設有密碼,父親的妻子寄來商業文件、檔案、地圖與鎖碼之後,奧莉薇必須解開父親鎖住販賣機的密碼,接著前往一站又一站的販賣機設置點逐一補充。再者,這也是奧莉薇面對自己存在的根源並解開疑惑的旅行。事實上,奧莉薇是母親與傑克非婚生子女,這個非正統的起源似有若無地存在於小說文本之中,如同一個大問號,屢屢出現在奧莉薇的敘事裡。例如外婆在日記中質問自己當初勉強奧莉薇母親與查理歐結婚是否正確決定,以及奧莉薇常常察覺母親的不快樂,是否起因於父親查理歐並非最愛,進而形成父親的沮喪挫敗,家庭的不和諧等等懷疑。奧莉薇諸多的疑惑終於到了最後與親生父親的鬼魂相遇,得到抒發。換言之,她在旅途中遇上自己親生父親的鬼魂,而親生父親是奧莉薇存在根源的化身,形成旅行/工作的路徑與存在的根源之交集。

更進一步探究,可以發現奧莉薇在旅行的歷程中回顧、追溯自己的根源,同時 瞭解到旅行的歷程已改變了自己的樣貌,而這是敘事者在時空疆界很明確的情境下 所無法達成的事。根據奧莉薇敘述,旅途中與親生父親鬼魂相遇,便是某次在加油 站補充販賣機時,那已經是最後一兩站的販賣機。奧莉薇突然發現不知從何出現的 父親便站在她的身邊,她開始和父親的鬼魂聊天,聊家人、男友等等,甚至抒發對親生父親的埋怨,質疑親生父親造成自己母親與查理歐不美滿的婚姻及不幸福的家,但始終鬼魂只是聆聽,直至奧莉薇不得不離開,前往下一個販賣機設置點。在這工作/旅行之中,奧莉薇遇見已逝親生父親的鬼魂,她與父親/鬼魂進行一場在現實中無法實現的對話,對話看似單向,內容看似與父親無關,但卻是一場追尋根源的對話。

在小說中親生父親與奧莉薇這個非婚生女兒之間的相逢幾乎無法在穩定、固定的時空下實現,因親生父親有自己的家庭,而奧莉薇的母親也另外成家,在兩者之間,奧莉薇的身分顯得不確定;但在這工作/旅行的交集之中,時空的疆界消失,兩人以不同型態(人與鬼魂)相逢對話,而不是親生父親與非婚生女兒的身分。因此在這工作的旅程,或說這補充販賣機的路徑(routes),對奧莉薇而言,無疑地面對了自己生命盤根錯節的根源(roots)。同時奧莉薇也體悟到,自己勢必再次離開;在回顧過往歷史、追溯根源之後,她必須再次上路出發,於是小說以「時候到了,我得離開了」結束(Kadohata 161)。

結語

小說《浮世》再現美國日裔族群的「家」,呼應多位的學者看法,認為家的定義已歷經變化,家不一定安頓於一處。儘管小說並未直接討論二次大戰時日裔美國人遭到集中囚禁的歷史創傷,但這歷史創傷造成無家的狀態隱然形成小說的背景,以及相較於傳統「家」固定於一處的意涵。小說藉由敘事者一家處於旅行狀態,呈現旅行中流動的家,而這樣的流動更真實呈現日裔移民至美國落腳、必須常常移動的生命經歷,也是反映二次大戰期間與之後五〇、六〇年代,日裔美國人既無法又被迫移動的情境。

除了旅行中的家之外,本文探討小說另一重要的主題則是「旅行/工作」 (travel/travail):事實上,旅行/工作的結合是日裔族群初期移民美國最常出現的生活 樣態。特別是在加州,日裔族群為了生活只能從事某類特定的工作,即農忙時期的 季節性移工,隨著季節及工作機會而不斷旅行,其不固定的工作往往迫使日裔族群 必須不斷旅行、移動,逐工作而居。小說也描寫了另一個與日裔族群緊密相關的工

作,也就是雛雞性別辨識的工作,幾乎成為一種刻板印象的標籤。這份工作要求日 裔族群在各地養雞繁殖場之間移動,而一向被認為身體易於規訓的日裔族群則必須 在狹小的空間裡,身體如同機器般運作而無法活動自如。無論是為了工作而不斷移 動,或者是在工作時身體無法自由活動,都反映族裔他者常被框限於某些刻板形象, 從事被認定適合他們的特定工作,無法進行社會或階級流動。

從流動、遷移、不穩定的家出發,藉由審視小說《浮世》中家的變動,並循著 小說敘事者旅行、工作的歷程,進入其中的公路等相關時空場域,本文探究小說隱 含的流動與無法流動之交錯辨證,包括集體日裔族群的(不)流動性,以及小說敘 事者個人的流動想望,於是小說最終讓敘事者再次踏上旅程路途、面向未來,而非 以安頓於一處作為結尾,反映出流動對於日裔族群具有深刻意義。

引用書目

- Azuma, Eiichiro. "Race, Citizenship, and the "Science of Chick Sexing": The Politics of Racial Identity among Japanese Americans."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78.2 (2009): 242-75. Web. *JSTOR*. 19 Mar. 2013.
- Bakhtin, M. M.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Trans. Caryl Emerson and Michael Holquist. Ed. Michael Holquist. Austin: U of Texas P, 1981. Print.
- Brah, Avtar. *Cartographies of Diaspora: Contesting Identiti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Print.
- Clifford, James. *Routes: Travel and Transl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P, 1997. Print.
- Cohen, Robert. *Global Diasporas: An Introduc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Print.
- Cresswell, Tim. *On the Move: Mobility in the Modern Western World*.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rint.
- Daniels, Roger. *Asian America: Chinese and Japanese in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1850.* Seattle and London: U of Washington P, 1988. Print.
- Gilroy, Paul. *The Black Atlantic: Modernity and Double Consciousness*.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93. Print.
- Grice, Helena. *Negotiating Identities: An Introduction to Asian American Women's Writing.*Manchester and New York: Manchester UP, 2002. Print.
- Hansen, Julie. "Space, Time and Plane Travel in Walter Kirn's Novel *Up in the Air.*" *Nordic Journal of English Studies* 11.3 (2012): 18-35. http://ojs.ub.gu.se/ojs/index.php/njes/issue/view/284 15 Jan. 2019.
- Kadohata, Cynthia. The Floating World.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89. Print.
- Lee, Hsiu-chuan. "Interview with Cynthia Kadohata." *MELUS* 32.2 (2007): 165-86. Web. JSTOR. 16 Sept. 2013.
- ---. "Writing Nation from (Un)Homes-Japanese American Families in Cynthia Kadohata's *The Floating World* and Lydia Minatoya's *Talking to High Monks in the Snow.*" *EurAmerica:*A Journal of European and American Studies 36.3 (2006): 359-94. Print.
- Lim, Shirley Geok-Lin "Immigration and Diaspora." *An Interethnic Companion to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Ed. King-Kok Cheung. New York: Cambridge UP, 1997. 289-311. Print.
- Lowe, Lisa. *Immigrant Acts: Immigrant Acts: On Asian American Cultural Politics*.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P, 1996. Print.
- Masterson, John. "Travel and/as Travail: Diasporic Dislocations in Abdulrazak Gurnah's by the Sea and Kiran Desai's the Inheritance of Loss." Journal of Commonwealth Literature

- 45.3 (2010): 409-27. Print.
- Morris, Meaghan. "At Henry Parkes Motel." *Australian Cultural Studies: A Reader*. Ed. John Frow and Meaghan Morris. Sydney and Chicago: Allen & Unwin and U of Illinois P, 1993. 241-75. Print.
- Nyman, Jopi. "The Hybridity of the Asian American Subject in Cynthia Kadohata's *The Floating World*." *Reconstructing Hybridity: Post-Colonial Studies in Transition*. Ed. Joel Kuortti and Jopi Nyman. Amsterdam: Rodopi, 2007. 191-204. Print.
- Oda, Meredith. The Gateway to the Pacific: Japanese Americans and the Remaking of San Francisco. Chicago: U of Chicago P, 2018. Print.
- Okawa, Gail Y. "Putting Their Lives on the Line: Personal Narrative as Political Discourse among Japanese Petitioners in American World War II Internment." *College English* 74.1 (2011): 50-68, Web. *JSTOR*. 15 March. 2019.
- Okihiro, Gary Y. *Margins and Mainstreams: Asians in American History and Culture.* Seattle & London: U of Washington P, 1994. Print.
- Park, You-Me, and Gayle Wald. "Native Daughters in the Promised Land: Gender, Race, and the Question of Separate Spheres." *American Literature* 70.3 (1998): 607–33. Web. *JSTOR*. 26 Sept. 2018.
- Primeau, Ronald. *Romance of the Road: the Literature of the American Highway*. Bowling Green, OH: Bowling Green State University Popular P, 1996. Print.
- Soklowski, Jeanne. "Internment and Post-War Japa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Toward a Theory of Divine Citizenship." *MELUS* 34.1 (2009): 69-93. Web. *JSTOR*. 15 March. 2019.
- Strauss, David. "Reconsidering Japanese-American Relations." *American Literary History* 8.3 (1996): 582-95. Web. *JSTOR*. 15 Jan. 2019.
- Vitkus, Daniel. "Labor and Travel on the Early Modern Stage: Representing the Travail of Travel in Dekker's *Old Fortunatus* and Shakespeare's *Pericles*" *Working Subjects in Early Modern English Drama*. Ed. Michelle Dowd and Natasha Korda.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225-42. Print.
- Wong, Sau-ling Cynthia. Reading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From Necessity to Extravaganc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P, 1993. Print.
- Yamamoto, Traise. Masking Selves, Making Subjects: Japanese American Women, Identity, and the Body. U of California P, 1999. Print.
- Yogi, Stan. "Japa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An Interethnic Companion to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Ed. King-Kok Cheung. New York: Cambridge UP, 1997. 125-55. Print.